高校大学生课外活动积极性及相关因素分析
——基于中国海洋大学的调查分析

王文琦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山东青岛　266100）

摘要：使用NSSE-China 2015问卷对中国海洋大学学生参与课外活动积极性情况进行了调研。研究发现：学生参与课外活动积极性水平在年级、性别、学科、高中担任校级职务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建议通过增加实践学分等方式激励大一学生积极参与课外活动，校内各院系之间应加强交流与合作，高校应当规范党员发展程序，多渠道地引导高校学生积极参与课外活动。实证分析结果有利于提升大学生参与课外活动积极性、提高高校教育质量、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对课外活动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变以往的教育评估模式，提供研究的新视角。

关键词：高等教育;课外活动;调查研究;NSSE-China;2015问卷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380(2017)04-0042-05

Factor Analysis on Enthusiasm of Participating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of College Students
—An Investigation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Wang Wenqi
（Law and Politics Institute,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Shandong　266100）

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the NSSE-China 2015 questionnaire to investigate students' enthusiasm of participating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grade level, gender, subject, position served in high school.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analysi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courage colleg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llege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vestigation; NSSE-China; 2015 questionnaire

课外活动是高校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必要途径，是高校培养全面发展型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文件都提出高等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文化艺术活动，加强社会实践的要求，指出要使高校大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增强社会责任感。

收稿日期：2017-03-24，**修回日期：**2017-05-29

从现状看，大学生的课外活动参与度与内容都有待于改进提高，那么高校大学生的课外活动参与积极性受哪些因素影响？以往对高校的调查分析往往集中于教学质量,即使涉及课外活动,其研究内容也仅限于对课外活动的特征、意义等方面的描述性分析,对高校大学生参加课外活动的积极性却忽视了影响因素分析。

对于高等教育而言,人才培养是根本任务,高等教育应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了解学生的课外活动参与状况是非常重要的。本文的研究以大学生课外活动积极性作为重点,基于中国海洋大学 2015 年调查数据,对大学生的课外活动参与状况进行分析,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学生参与课外活动积极性的影响因素,为教学改革、管理方式的改进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和理论依据,使其更具针对性和目的性;从课外活动角度入手,能够从学生的角度反映高等教育质量,有助于学校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于提升大学生参与课外活动积极性水平、提高高校教育质量、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对课外活动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变以往的教育评估模式,提供研究的新视角,科学判断学生全面发展。

一、文献综述

对于课外活动等核心概念,伍安春等[1]认为课外活动是在教育者的直接或间接指导下来实现教育目的的一种活动,相较于课堂教学活动,它的实现途径是根据受教育者的需要和自身的努力以及教育、教学的需要。David Keer 等[2]对课外活动做出了具体界定,包括志愿服务、社团实践以及校际交流等。课外活动既可以在校内进行,也可以在校外实施。在美国学者看来,“辅助课程”意在强调课外活动是对学术课程的丰富和补充。

近年来,对于课外活动的影响因素,学者们也进行了相关研究。朱红根等[3]提出家庭经济水平、学生干部身份、身高、特长有无及家庭居住地等 5 个因素是影响大学生是否参与课外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林莹、[4]关彦来[5]提到缺乏激励是导致大学生丧失参加课外活动积极性的原因之一。同时,学者们也对课外活动的意义、类型及其改进措施等方面作了相关研究。在课外活动方面,Herbert Marsh 做了对比分析,[6] Benjamin G Gibbs 等做了调查,[7]他们得出的结论都认为学生参与课外活动会增强对学校的热爱,增强教育效果。李莉[8]认为培养大学生创造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实施规范的大学课外教育。在课外活动的改进措施上,张木[9]认为,可以通过运用项目管理的基本技术方法，在加强大学生课外活动项目化管理的基础上,提高大学生课外活动的质量。李刚[10]以西安石油大学石油工程学院为例,探索了“两期两平台”的课外活动模式。综上所述,本研究将“课外活动”定义为:课外活动是指在课堂教学之外,实现教育目的的其他一切活动。

二、研究方法、研究工具

1. 研究方法

本调查在中国海洋大学全校范围内进行随机抽样,共发放问卷 1657 份,回收有效问卷 1647 份,有效回收率为 99.4%。调查对象中男生占 45.4%(753 人),女生为 54.6%(904 人);汉族样本占 90.9%(1507 人),少数民族样本为 7.9%(131 人),其中涉及藏族、朝鲜族、哈萨克族、回族、满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大一学生占比 25.3%(419 人)、大二占比 25.8%(427 人)、大三占比 25.2%(418 人)，大四占比 23.7%(393 人),年级分布相对均匀。

2. 研究工具:NSSE-China2015 问卷

本研究使用“全美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NSSE)问卷的汉化版(NSSE-China)作为调查工具。根据 NESS-China2015 问卷中问题 15,由“实习”“社会实践或调查”“社区服务或志愿者”“向专业学术期刊/学术会议等投稿”“参加学习社团(如读书会、英语俱乐部等)”“和任课教师一起做研究课程要求以外的语言学习(如上新东方、修二外等)”“海外学习(短期或长期)”“参加各类学术、专业、创业或设计竞赛”“报考专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辅修第二学位/专业”等问题构成“课外活动积极性”量表;同时赋值原则为,“以下哪些活动是你已经做了，或者打算在毕业之前做的？”选项包括以下四种:1=已经做了;2=打算做;3=不打算做;4=还没决定,将“1=已经做了”赋值为 100,其余选项赋值为 0。

3. 统计分析方法

本次调查数据结构的建立和数据的分析处理均借助 SPSS 20.0 软件进行,主要运用的分析有:①描述统计,对样本的人口学特征进行统计(涉及性别、年级、民族等);②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大学生的课外

互动积极性是否会因年级、性别、政治面貌、学科、学生干部担任经验、教育环境的不同而存在显著性差异。

三、研究结果

1. 大学生课外活动积极性的年级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年级学生课外活动积极性水平的均值存在一定的差异，从图 1 中我们可以看出学生课外活动积极性水平与年级存在正的线性相关关系，呈现出随着年级增加学生课外活动积极性水平上升的趋势，大四学生的课外活动积极性水平（M=44.09）要高于大三（M=35.68）、大二（M=26.28）及大一年级（M=14.88）。为研究具体年级间课外活动积极性水平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我们进行了单因素方差检验，其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结果表明，不同年级间学生课外活动积极性水平存在显著差异（F=156.421，p=0.000<0.05）。经过 LSD 事后检验，我们发现大四学生课外活动积极性水平最高，且与大一、大二、大三学生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0）；同时，我们发现大一、大二、大三年级学生的课外活动积极性水平分别与其他三个年级之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 值均为 0.000，均小于 0.05）。原因可能在于：大四的学生面临就业与升学的压力，在就业方面，不管是考公务员还是进企业，大多数同学都会选择外出实习以及报考专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而在升学方面，不管是考研还是出国留学，向专业学术期刊/学术会议等投稿、和任课教师一起做研究课程要求以外的语言学习（如上“新东方”、修二外等）、海外学习（短期或长期）等也成为多数同学的选择，所以大四学生课外活动积极性水平最高。而到了大三，学生开始在社团担任重要职务，同时课业负担已不再很重的情况下，实习，社会实践或调查，社区服务或志愿者，参加学习社团（如读书会、英语俱乐部等），参加各类学术、专业、创业或设计竞赛以及报考专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等也成为部分学生的选择。反观大一，由于一年级的课程安排多、时间紧，相较于高年级同学来说课业负担重，同时部分修双专业或者想转专业的同学更要利用更多的时间在学习上，而此时就业和升学的压力也较小，因此大一学生课外活动积极性水平最低，且与大二、大三、大四年级学生的课外活动积极性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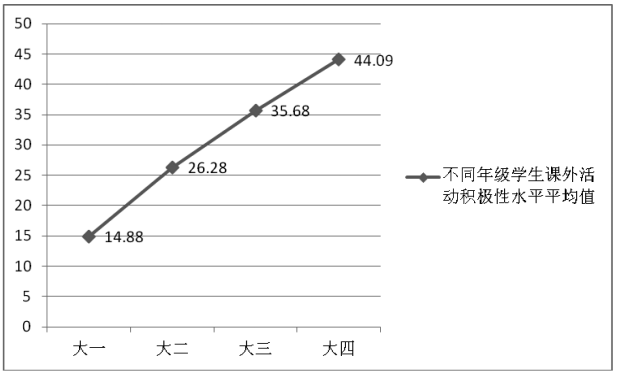

图 1 不同年级学生课外活动积极性水平平均值折线图

表 1 不同年级学生课外活动积极性水平单因素方差分析

	平方和	df	平均值平方	F	显著性
群组之间	192064.769	3	64021.590	156.421	.000
在群组内	671237.548	1640	409.291		
总计	863302.316	1643			

数据来源：根据本文数据库的相关数据整理。

2. 大学生社团活动积极性的性别差异

为研究具体年级间课外活动积极性水平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我们进行了单因素方差检验，其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男女生的课外活动积极性存在显著差异（p=0.000）。其中女生课外活动积极性水平（M=32.27）高于男生的课外活动积极性水平（M=27.28）。原因可能在于：就中国海洋大学本身的性别比例来看，女生的数量大于男生；同时，女生在人际交往、语言学习等方面先天条件要优于男性，因此在参加学习社团（如读书会、英语俱乐部等）、和任课教师一起做研究课程要求以外的语言学习（如上新东方、修二外等）、社区服务或志愿者、报考专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等方面体现出更高的积极性；另外，海大属于理工类高校，男生多集中于信息、工程等理工类学院，该类型的学院科研任务较重，学生基本每天都被老师要求到实验室做实验，即使没有实验任务，每天的出勤也是必不可少，因此男生在参加课外活动的时间与自由上较女生有所欠缺。

表 2 不同性别学生课外活动积极性水平单因素方差分析

活动积极性	平方和	df	平均值平方	F	显著性
群组之间	10 116.702	1	10 116.702	19.470	.000
在群组内	853 185.614	1642	519.601		
总计	863 302.316	1643			

数据来源：根据本文数据库的相关数据整理。

3. 大学生课外活动积极性的政治面貌差异

为研究大学生课外活动积极性的政治面貌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我们进行了单因素方差检验，其研究结论如表 3 所示。共青团员（含入党积极分子）、共产党员（含预备党员）、群众和民主党派之间的活动积极性并不存在显著差异（P=0.273>0.05）。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学生党员的比例并不是很高，其数量并不是很多；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改革，高校大学生的入党动机表现出多元化的趋向，[11] 所以在政治面貌上，共青团员（含入党积极分子）、共产党员（含预备党员）、群众和民主党派之间的活动积极性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3　不同政治面貌学生课外活动积极性水平单因素方差分析

	平方和	*df*	平均值平方	*F*	显著性
群组之间	2028.617	3	676.206	1.300	.273
在群组内	843113.150	1621	520.119		
总计	845141.767	1624			

数据来源：根据本文数据库的相关数据整理。

4. 大学生课外活动积极性的学科差异

学生所学的专业不同，对社团活动积极性的影响也存在一定差异。根据数据库情况，我们将文学、历史学、哲学、教育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艺术学划分为偏文科类，而将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建筑学划分为偏理科类。为探讨两者之间的课外活动积极性水平是否达到了显著性水平，我们进行了两者的单因素方差分析，如表 4 所示，文理科大学生的课外活动积极性水平存在显著差异（p=0.016<0.05），其中文科生的课外活动积极性水平（M=31.61）高于理科生（M=28.85）。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文科生比理科生在人际交往、工作管理等方面更擅长组织协调，因此也有更多的优势和积极性参与课外活动；另一方面，理科生科研任务更重也是其参与课外活动积极性不如文科生的原因之一，这也解释了之前男女生的课外活动积极性存在显著差异且女生课外活动积极性水平高于男生的课外活动积极性水平。

5. 学生干部担任经验的影响

关于高中担任校级职务对课外活动积极性的影响，我们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 5）表明，高中担任校级职务对课外活动积极性具有显著性影响（p=0.000<0.05），其中在高中担任过校级职务的学生的课外活动积极性（M=34.88）要高于没有在高中担任过校级职务的学生（M=28.37）。原因可能在于：曾经在高中担任过校级职务的学生，积累了更多学生工作以及社团工作的经验，有利于其在进入大学以后，比没有在高中担任过校级职务的学生拥有更多的自信和能力，也有更多的兴趣参与社会实践或调查，社区服务或志愿者，参加学习社团（如读书会、英语俱乐部等）以及各类学术、专业、创业或设计竞赛等课外活动；同时曾经在高中担任过校级职务的经历也成为学生的个人财富之一，在日后实习、海外学习（短期或长期）等课外活动中有利于其留任或者深入发展。

表 4　不同学科学生课外活动积极性水平单因素方差分析

	平方和	*df*	平均值平方	*F*	显著性
群组之间	3 051.707	1	3 051.707	5.825	.016
在群组内	860 250.609	1642	523.904		
总计	863 302.316	1643			

数据来源：根据本文数据库的相关数据整理。

表 5　高中担任校级职务对课外活动积极性的影响

	平方和	*df*	平均值平方	*F*	显著性
群组之间	13289.607	1	13289.607	25.669	.000
在群组内	847021.446	1636	517.739		
总计	860311.053	1637			

数据来源：根据本文数据库的相关数据整理。

6.教育环境的影响

在课外活动方面，学生的教育环境也是影响因素之一，为此我们选取了学生初中和高中学校所在地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表 6）表明，就读学校所在地作为影响因素对学生课外活动积极性方面，初中（p=0.615>0.05）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高中（p=0.025<0.05）存在。通过高中就读学校所在地的单因素方差分析事后比较 LSD 法的结果可以发现，高中就读学校所在地属于直辖市的均值最高（M=31.7172），高中就读学校所在地属于农村的均值最低（M=12.5874）；同时高中就读学校所在地属于“农村”的学生的课外活动积极性 P=0.05，处于临界值，而高中就读学校所在地属于“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城市”“县城”和“镇区”的 P 值均大于 0.05。原因可能在于：高中相较于小学和初中，在教育对象、教育目标和任务、教育处境等方面都具备复杂性，[12] 同时，高中教育在教学方法、课程内容等体现出与大学教育的衔接功能[13]，因此高中就读学校

所在地对学生的课外活动积极性存在显著性差异；余秀兰认为，文化再生产现象存在于我国教育中，它使得大多数农村学生被教育所淘汰而返回农村，并最终形成封闭的城市优势文化圈和农村劣势文化圈。[14] 因此，高中就读学校所在地属于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城市、县城和镇区的学生，相比于高中就读学校所在地属于农村的学生，受到过更好的教育、拥有过更多的教育资源，在个人学习、实践、成长等方面拥有更多的经验、能力、兴趣和信心，所以参加课外活动的积极性比较高一点。

表 6　不同教育环境对学生课外活动积极性的影响

题项		平方和	df	平均值平方	F	显著性
初中（就读学校的所在地属于）	群组之间	1852.530	5	370.506	.711	.615
	在群组内	843289.238	1619	520.870		
	总计	845141.767	1624			
高中（就读学校的所在地属于）	群组之间	6709.158	5	1341.83	2.565	.025
	在群组内	853601.895	1632	523.040		
	总计	860311.053	1637			

数据来源：根据本文数据库的相关数据整理。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中国海洋大学的学生课外活动积极性水平较好，具体结论为：①大四学生课外活动积极性水平最高。②男女生的课外活动积极性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女生课外活动积极性水平高于男生。③共青团员（含入党积极分子）、共产党员（含预备党员）、群众和民主党派之间的活动积极性并不存在显著差异。④文理科大学生的社团活动积极性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文科生的课外活动积极性水平高于理科生。⑤高中担任校级职务对课外活动积极性具有显著性影响，其中在高中担任过校级职务的大学生的课外活动积极性高于没有担任的。⑥初中就读学校所在地的类型之间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是高中就读学校所在地类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高中就读学校所在地属于直辖市的均值最高，高中就读学校所在地属于农村的均值最低。

鉴于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建议：第一，通过增加实践学分等方式激励大一学生积极参与课外活动；提高公益活动、专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在期末素质测评中的计分比重。第二，高校各院系之间，尤其是文理科院系之间在学术、比赛、文体活动上应加强交流与合作，借以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扩大活动规模，提高活动影响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第三，高校应当规范党员发展程序，多渠道地引导高校学生积极参与课外活动；党员应当自觉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积极参与课外活动。

参考文献

[1] 伍安春，尕峰.国外大学生课外活动对我国开展素质教育的启示[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6(5):174-176.

[2] Filiz Keser, Hanife Akar, Ali Yildirim The Role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 Active Citizenship Education[J].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2011 (6).

[3] 朱红根，赵刚，简政，等.大学生参与课外活动意愿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146-149.

[4] 林莹.浅谈如何提高大学生参与课外活动的积极性[J].科教文汇（上旬刊），2013(3):136-137.

[5] 关彦来. 浅谈如何提高高校学生参与课外活动的积极性[J].知识经济，2016(1):180-180.

[6] Marsh H.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Beneficial Extension of the Tranditional Curriculum or Subversion of Academic Goal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7] Benjamin G Gibbs, Lance D Erickson, Mikaela J Dufur, et al. Extracurricular Associatious and College Enrollment [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5(50): 367-381.

[8] 李莉.大学生课外活动对创造性人格发展的作用[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0(1):175-245.

[9] 张木.大学生课外活动的项目化管理[J].教育教学论坛，2012(27):201-202.

[10] 李刚."两期两平台"大学生课外活动模式的探索与实践[J]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6(6):132-132.

[11] 李阳.关于高校学生入党动机的辩证思考[J].中国科技信息，2012(22)：186-187.

[12] 程思辉，汪春.论高中教育的复杂性及其对高中教育改革的要求[J].教育学报，2014(4)：74-79.

[13] 綦春霞，周慧.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的衔接：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J].教育学报，2014(4):26-33.

[14] 余秀兰.中国教育的城乡差异——一种文化再生产现象的分析[D].南京：南京大学，2002.